

学人文库

周公事迹研究

杨朝明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学人文库

杨朝明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周子事迹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公事迹研究/杨朝明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1

(学人文库)

ISBN 7-5348-2054-5

I. 周… II. 杨… III. 周公 - 人物研究
IV. K827 =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156 号

责任编辑:孟 良

责任校对:洛 华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东方红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 / 32

印张:10.25

字数:226 千字 **印数:**1—1 500 册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2054-5 / K·823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本书得到孔子文化大学(曲阜师范大学)
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

序 言

曲阜师范大学杨朝明博士,有两部新著即将先后出版。这两部书论述范围彼此不同,但内容相关,主旨也属一贯。《周公事迹研究》考订周公史事本末,以论证详密、层次明晰为先,《鲁文化史》则通论鲁国文化兴衰,以脉络清楚、征引广博见长。读者如能合观这两书,就不难了解杨朝明博士在学术研究中的趋向与成就。

杨朝明博士致力于鲁国历史和文化的探讨,已经有若干年了。他长期在曲阜师范大学,涵泳于鲁故城与孔学的氛围之间,并在《齐鲁学刊》任编辑工作,努力奋勉,知见广而论作多。如他追随曲师大郭克煜先生,曾参加《鲁国史》的编撰。这部有开拓性的专著,全书一半章节即由他执笔。其中有关周公封鲁及礼乐文化的部分,正出自杨朝明博士之手,可知今天他的新著实系蓄积已久。同时他更继续进修,历经种种困难,以在职身份取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学位,其学可谓专精有成。

近年,在先秦史学界中,社会与文化的区域研究有愈来愈兴盛的趋势。我曾经在一些小文中说明,这种潮流的肇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吴越文化同40年代提出的巴蜀文化研究,而以70年代以来的楚文化研究规模最为盛大。总的说

来,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原以外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发展较快,——成为专门之学,而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却较显冷漠。这或许是自古学界的注意力从来集中于中原地带的偏向的一种纠正吧。不过,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都位于中原,中原地区的特殊重要,究竟是不容忽略的。

在周代的中原地区内,鲁国的历史文化特别需要研究。鲁国乃周公元子所封,禀承周朝传统,以致春秋时人有“周礼尽在鲁矣”之叹。这方面的问题,杨向奎先生在《鲁国史》一书的序里,已有扼要的论述。杨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应“以鲁为正统”。他引用《淮南子·齐俗》所记周公与太公受封相见的故事,认为鲁国尊亲,是周人宗法社会的传统,也是儒家学说“仁”的渊源,而齐国举贤上功,则是功利主义。“鲁守宗周传统,‘周礼在鲁’,而齐国偏离此道,遂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概括。……周公之道以德、礼为核心,而孔子之道以仁、礼为内容。”他还以“宗周→鲁国”、“周公→孔子”两条线作为图解。杨先生多年深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且熟于经学史,其这一观点是极具启示性的。

古代的学原在官府,周公一类政治人物,情况固与以学术活动为主的孔子不同,然而读《尚书》周公所论,不能否认他在思想发展的历史上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以前我论及昭穆时的祭公,也有类似的意见。尤其是由文化的传承来看,更是如此。后来的管仲、晏婴等,地位也处于政治、学术人物之间。我们研究周代,特别鲁国,自当于此措意。

周公以及鲁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涉及好多学科的问题,有不少疑难等待研究解决。比如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历代学者论辩纷纭,甚至影响到青铜器铭文的读释。究其底里,

分歧乃在于《尚书·洛诰》怎样理解,竟成为悬疑两千余年的谜团。即使是近年新发现材料,也多不易克服的难点。记得初见1983年末江陵张家山出土汉简中的《奏讞书》,记有柳下季断案事例,引鲁法云:“盗一钱到廿,罚金一两;过廿到百,罚金二两;过百到二百,为白徒;过二百到千,完为倡。”并说明:“白徒者,当今隶臣妾;倡,当城旦。”文辞没有什么费解,而“白徒”和“倡”怎样作为刑徒名称,实无法得其答案。看来,我们关于鲁国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

曲阜师范大学的学者,一直重视鲁国历史与学术文化,建有孔子研究所,近又发展为孔子文化学院,从事以孔学为中心的多方面研究,成绩显著,为海内外学界共知。杨朝明博士的两部新著,是这一传统的继续,其中包含好多新的研究和见解。由于两书关系密切,我就以这一篇小序,同时向读者推荐。

李学勤

2001年5月12日

序

朝明同志的著作《周公事迹研究》，乍从题目上看，不太会引人注意。因为研究周初史事与周公事迹，是个老题目，现在再来做，好像是旧曲重弹。但是，读了两遍书稿后，我觉得本书在这样一个已很难深入的题目上，还是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做学问的人都有体会，搞一个新题目，虽缺少研究基础与参考成果，但比较容易出成绩。做一个已为前人研究多年的老题目，想要出成绩，相对要困难得多，精力也要花费得更多，但搞好了，则尤见功力，本书给我总的感觉就是这样。

周公事迹及相关的周初史事，凡治先秦史的学者皆知其研究起来有相当难度，资料较缺乏，有关文献记载也较费解，汉以来虽多有学者研究，但对同一史事的考证常异说纷纭。作者知难而上，广征博引诸种文献史料，对所记载的史实重新梳理、考辨，去粗取精，以为立论之依据，同时又悉心研读以往诸家有关研究成果，逐一进行评判，择其善者作为立论之参考，并注意以科学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去观察、分析、认识历史现象，故对有关周公事迹的几个重要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一定的创获。择其要者，似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周公事迹本身的考察，其结论有相当的说服力。

例如有关“周公称王”问题，作者否定周公称王说，认为《尚书》中周初诰命所记“王若曰”，只是周公摄政代宣王命，周公并未称王。所以能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单纯着眼于对文献中所记周公事迹做考证，而是注意考察当时西周王朝所推行的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分析周公事迹所由发生的环境与历史背景。因为讨论周公是否称王，必当涉及周人王位继承制度。作者对此一制度之实况从多方面做了考证，追本溯源，论证当时周人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周公亦不可能违背此制，所以不可能擅自称王。文章不满足于此，又进一步通过史料的梳析，考证武王去世时成王虽年少，但已即位，而非如战国秦汉时人所云尚在襁褓之中，所以，成王在武王故去后即已就位，周公只是以冢宰身份摄理国政。可以说本书对此疑难问题的研究是目前所见同类研究中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的，结论也因此有较强的科学性与可信性。

其次，本书在与周公事迹相关的其他周初史事的考证上也取得较多成绩。例如论西周建立前周先王世系关系，周弃至不窋世为后稷，太伯、虞仲奔吴与长子继承制之关系，又如论文王、武王年寿，唐叔受封时之年龄，以及《尚书·金縢》所记周公“居东”之地望等，凡此，均是令治先秦古史的学者深感迷惑之学术难点。作者不盲信前人已有之结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有关文献的梳理条缕，细致而深透，解释亦合理，故结论平允，且多有新意。

再者，本书附有对几种重要史籍的可信性研究，从而使正文的全部论述建立于对史料进行较扎实的整理的基础上。此方面所做研究也多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进展。例如对《今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与成书过程的钩沉索隐，对于科学地看待与利用这部著作很有裨益。

总之,像我在前面已提到的,我认为本书选了一个难度很大的老题目,做了一种虽平实但又非常扎实、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工作。结论不求新奇,但足资同行学者参考。现在做先秦史研究,提倡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文献以外,考古、古文字、民族学的资料与研究方法都应该注意综合运用,本书所做研究如能在此方面有所加强,特别是尽可能多利用一些古文字资料,可能会使论述更为丰富。当然,我觉得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先秦历史,其最基础的工作应该是对文献的深入钻研,本书在科学利用历史文献方面是成功的,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朱凤瀚

2001年5月

目 录

1

学
人
文
库

序言	李学勤
序	朱凤瀚
一、绪论	1
二、周公长子管叔考	27
三、周公摄政而未称王	42
(一)殷周时期通行嫡长子继承制	44
1. 近人殷周继承制度研究之检讨	45
2. 关于鲁国的“一继一及”现象	54
3. 周先人的继承制与武王传位	66
(二)武王去世时成王“尚幼”	79
1. 武王之享年	79
2. 成王“未离襁褓”说之误	87
3. 成王即位时“尚幼”	92
4. 关于唐叔虞的记载	97
(三)周公以冢宰摄政七年	102
1. 周公以冢宰摄政	102
2. 周公摄政实辅成王	109

3. 摄政七年归政	114
(四)《周诰》中的“王”非指周公	116
四、周公的历史功绩	138
(一)稳定周初局势	138
1. 救乱	139
2. 克殷	143
3. 践奄	144
(二)巩固周朝统治	149
1. 建侯卫	149
2. 营成周	156
3. 制礼作乐	157
五、关于“周公封鲁”问题	173
六、周公事迹编年	184
附篇一、《今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初议	193
附篇二、沈约与《今本竹书纪年》	207
附篇三、也说《金縢》	226
附篇四、《周诰》诸篇次序考订	244
附篇五、《洛诰》研究	267
附篇六、《逸周书》有关周公诸篇刍议	287
主要征引与参考文献	303
后 记	312

一、绪 论

半个多世纪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1]作为周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不仅在周朝灭商、稳固周朝的统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更对此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周公之所以影响后世巨大,首先在于他一生辅国安邦的实践活动,也就是对于周王朝的卓著政绩,还有他的品格和能力。据说,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周公本人亦自称“巧能”、“多材多艺”。武王在位时,周公全力辅翼,并以忠诚见称于史。如克殷后二年,武王有疾,当时,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摇,群臣忧惧,遂向先王卜求救助,“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2],愿以自身替代武王。及武王去世后,周公又担负起安定天下,巩固周朝统治的重任。一般载籍以为,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便毅然暂行天子之政,为稳固周朝统治做了大量工作。如《尚书大传》就铺陈周公的德业说: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3]

《尚书大传》的说法未必完全准确可靠,然而,为得天下之贤人,周公曾“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4],为建立周的统治秩序,他的确是呕心沥血的。清代学者孙诒让说:“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5]成、康二王之时,“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6],这与周公的切实努力不无关联。

周公的形象非常符合儒家道德的理想人格,因而他本人便成了中国儒学的先驱者。周公的实践活动是儒家思想学说的典范,周公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尚贤”等政治思想,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王室衰微,社会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变动,这对孔子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孔子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治”,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便是周公的事业。在他的心目中,周公是最为令人敬服的古代圣人之一,所以他甚至常常“梦见周公”^[7];孟子也常提到周公,曾把他与大禹、孔子相提并论^[8];而在荀子看来,周公的所作所为更是“非圣人莫之能为”,周公的行为乃是“大儒之效”^[9]。

先秦时期孔、孟、荀等儒学大师对周公的推尊,已清楚表明了周公对于儒学及孔子思想体系的影响,他们对以周公为代表的古代圣人存留下来的思想材料进行了思考和继承自不待言。汉人称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10],显然是看到了尧、舜、禹、汤以及文、武、周公乃是儒学思想体系的主要渊源。正是因为如此,唐朝韩愈以后的历代儒者在排列儒家道统时,总是自尧、舜到周、孔相续相连。然而尧、舜、禹、汤时代久远,文王、武王资料阙略,对孔子和早期儒学影响较大亦较直接者还是周公,故荀子称“儒者法先王”^[11],同时又以周公为“大儒之效”。

周公之德业是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先导,并由此影响了久远的后世。而孔子的思想不仅有显著的春秋战国的时代特色,而且又有明显的鲁国的地域特色。周代的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死后,鲁国建太庙奉祀^[12]。由于鲁为周公之后,又是姬姓“宗邦”,鲁人自不会忘记祖述先王之训,追忆周公之礼。惟其如此,后人才有“周礼尽在鲁矣”^[13]的说法,鲁国也成为各国诸侯学习周礼的去处^[14]。鲁地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鲁国建立后,周人又以此作为经略的重点。鲁国因是周公长子伯禽之后而成为周代的“文物之邦”,儒家孔子之学则由于鲁为“文物之邦”而兴而盛。《淮南子·要略》曾经说到这一点:

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后人赞颂周公也都看到了他对儒学产生的影响,如明人陈凤梧《元圣文宪王像赞》曰:

天生元圣,道隆德备。制礼作乐,经天纬地。

上承文武,下启孔颜。功在万世,位参两间。^[15]

清朝乾隆皇帝手书曲阜周公庙周公像对联则曰:

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

图书象演,尼山统绪本先型。

可见后人 also 认为孔子之学导源于周公,难怪汉代以后的人常常“周、孔”并称^[16]。

周公影响了孔子和儒学,影响了整个思想界,也影响到了古代的中国政治。周公是周初的政治人物,直接记载周公事迹的文献毕竟有限,而幸存的《尚书》等史籍又诘屈聱牙,晦涩难懂,

因而后人在认字释义上便不能不产生分歧；另一方面，古书的形成和流传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17]，周公的事迹便显得若明若暗。如关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18]，杨向奎先生说：

周公元圣，先孔子而称圣，是道德完人，于是周公之摄政称王，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在西汉曾经出现两次以周公辅幼主为借口而当权夺权的事件，后来的明成祖与方孝孺的争论也以此为借口。西汉霍光辅昭帝曾以周公事作喻，但霍光专政，没有称王；而汉末王莽之夺权，以周公为借口，更是经学家所乐道，于是而有刘歆纂经、王莽篡汉之千古悬案。而周公之辅政，取代与否，称王与否，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19]

周公时代过去了几千年，周公、成王之事仍然如清未经学家廖平在《经话》中所说“为经学一大疑”，迄未取得一致看法。

古代经史上的学术问题往往与政治问题密切关联，不可分割，周公“摄政称王”事尤其如此。经史学家们评说历史的、现实的政治问题，往往借助于旧有史事，周公、成王事便不止一次地被人们提起。例如，清初的高士奇就曾以之议论春秋之初鲁国的隐公摄政。隐公为桓公兄，但隐公是惠公继室之子，桓公本为嫡子。隐公未摄位前，桓公已在惠公时被立为太子。惠公死后，桓公幼弱，故隐公暂摄君位，且笃守居摄之义^[20]。然而，十几年后，正当隐公欲让位于桓公时，桓公却受人挑拨，使人杀了隐公。对此，高士奇议论说：

使隐能如周公辅成王故事，抱负以临群臣、听国政，即不然，令桓毓质深官，己则身都鲁相，而代之经理，其发号施令，入告王朝，通问邻国，一称桓君而已无与焉，则名分定，

而已之心迹亦明。虽有百奸人，乌（朝明按：当为焉）能离间于其间哉？^[21]

然而，尽管后人以周公、成王事来评人论事，但其事究竟如何，直到现在学界的观点依然存在截然的分歧。不仅如此，人们对有关周公的其他许多问题也都有不尽一致的认识，如周公在什么情况下归政成王，周公营建洛邑、周公制礼作乐、周公与鲁国的关系等都是如此。周公之事，尤其是周公“摄政称王”等事，既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它牵涉到对殷周时期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弄清楚周公的事迹固然意义重大，却依然困难重重，所幸学界前辈、同仁对有关周公的事迹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一些研究已接触到了问题之肯綮，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扫清了不少障碍。

综观以往的研究，各家各说之所以纷陈不一，说到底还是一个对有关历史资料的辨析问题。鄙意以为，要准确地认识殷末周初的历史事实，正确把握周公其人在这个历史剧烈变动时期所处的地位，在分析、解释有关周公的史料时，首先应当解决以下几个重要的认识问题：

第一，对殷商文明的发展程度应有一个符合实际的估价。

对殷商时期文明程度的估计，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殷末周初历史事实的认识，因为它决定着殷商文明对殷人以外其他各族的影响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周人灭商之后所面临形势的严峻程度。比如，如果殷商时期是中国上古文明发展的初期，那么，殷商国家的上层建筑就不至于十分完备，殷人的宗法礼制等精神方面的文明或许刚刚形成，对于周族的影响也就会十分有限。这种情形，也决定了殷商王朝对于其他部族方国的政治统治相对松散，周人推翻商朝后，收服各族亦不至于要费太